

## 序言

# 我们为什么要发声？



近年来，关注我们科研团队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到我们在连续“发声”。不仅在海内外出版了十几本书、在各类学术性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而且在B站（哔哩哔哩）建立了“国仁乡建”“全球大学”两个公众号，在抖音和头条上也直接以“温铁军”命名了公众号，<sup>①</sup>并且为这些传播工具安排组织了志愿者团队来维护，遂在网上形成了多种形式的发声渠道。为什么呢？

首先是知识生产应该自觉地服务于国家需求。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确立为国家战略，标志着一个国家重大战略转型的大时代的形成——乡村振兴既是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也是练好内功夯实基础、向生态文明转型的主战场。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型，更是被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性所充分表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

<sup>①</sup> 特别提示，除了这些我们公布的公众号之外，其他自媒体发表的内容都不是我们授权的。

“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sup>①</sup>

并且，中央已经把乡村振兴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时间分段上统一起来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全面现代化，同年完成乡村全面振兴。

据此，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存在着的紧密相关的内在逻辑的理解。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需要协调“物质精神”双文明，对内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对外走“和平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相对而言，过于激进的西方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和金融化、虚拟化，及其客观上导致的房地产泡沫化与金融加杠杆难以遏止等问题，不仅成为受关注和管控的问题领域，而且一旦这些已经泡沫化泛滥的趋势有所阻遏，所造成的经济下行会很快被“带节奏”地反过来用于指责中央宏观调控——粗放数量型发展期间已经尾大不掉的资本利益集团们的声音“瓦缶雷鸣”地在政策领域大肆传播，社会各界特别是中下层群众深受其害却没有辨析能力，急需有人为他们发声。

诚然，自从“三农”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二十多年来，我们各地乡建团队长期认同的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家更多开展基层调研和乡村试验，较少“主动”地在社会上发声，对

<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7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各类不解和批评也一概不予回应。但，现在全球化危机异常复杂，需要配合国家应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风险和挑战，需要支撑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调整。因此，我们最近几年组织力量出版和发表了不少作品，提出了应对全球危机要加固乡村的“劳动力池”作用和扩大生态产业化的“资产池”等理论创新，也在一些媒体上用视频等形式向大家普及“三农”领域知识、汇报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人觉得很好，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客观存在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有人觉得我们很烦，喋喋不休地几十年来一直说“三农”、乐此不疲地为乡村振兴“鼓”与“呼”……但，无论好恶，我们不断地发声呐喊，确实还能起点作用。

这不是要争辩哪一类建议在国家重大政策表述上更有优势，而是我们凭借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以及长期在海内外深入基层做调查研究形成的积累，为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挑战更好地打造“压舱石”，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大局贡献一份力量。这大抵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一份自觉意识。

发声，因为我们仍处在“居危思危”<sup>①</sup>阶段。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的发展历史一直是危机四伏，也由此而有“多难兴邦”的经验。那么，为什么现在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主要因为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内爆”趋势显著——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应对经济下行，与欧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统一行动，大规模地制造流动性过剩，向全球转嫁美国和西方推进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所导致的泡沫崩溃的代价。对我们中国来说，意味着越多进口、越多为世界生产，就越

<sup>①</sup> 我们团队在2016年出版了《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一书。

多吃进通胀，简单说叫输入型通胀。接着就得问，有谁愿意继续这样吃人家输出的代价吗？这是全球化挑战的第一大问题。接着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了，那些靠着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受益的国家已经把收益都花掉了，当价格陡然降下来，比如石油价格从148美元又降回到30美元的时候，这些得了原材料涨价好处的国家突然没收益了，消费突然萎缩，就导致全球通缩，外需大幅度下降。

从全球通胀到全球通缩，客观上是那个所谓主导全球化的霸权国家一手造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继续跟从霸权国家的利益要求沿着这个吃进代价的方式继续走老路吗？为什么在“十四五”规划上，中国必须要转向“新阶段”——调整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因为一会儿全球通胀，一会儿全球通缩，进口通胀和进口通缩对我国来说都是承担了率先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美欧日连续出台量化宽松的成本转嫁。加之2018年以来霸权国家发起全球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对华连续进攻，即使我们想继续走沿海地区大搞外向型经济和融入全球化的老路，人家也不让走了。

所以，我们遭遇的全球化挑战是个长期战略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全球供应链破坏。实际上，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早就开始了。在2019年疫情发生之前已经有10年左右时间。我国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开始就不仅一直面临着大起大落变化无常的全球化成本转嫁问题，而且那时候霸权国家就“高调重返亚太”，把60%的军事力量转向亚太地区。

由此，我们既要着眼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阶段，还要考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必须练好内功应对危机，牢牢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发挥出“三农”压舱石、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发声，因为中国思想理论界还未摆脱西方话语体系。

众所周知，世界上90%以上的资讯是使用英语书写、因被西方大资本集团掌控而刻意强调“自由”的媒体发布的。这个“资本掌控自由媒体”的西方化基本架构，具有赢家通吃、对全球思想界和理论界达至“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能力，这就决定了在全球化解体这个重大的历史性和世界性危机面前，我们似乎还很难用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作为基础的中国话语去建构支撑应对软实力挑战的能力。

从100多年前洋务运动开始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起，早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积极性，经历了差不多100年的激进演化，应该说就已经逐渐变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某种程度上，连“中学为用”都很难再成立了，基本上就是一个被西学全覆盖的状况。这类以西学为主的学科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经验做出的解释，相当于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覆盖，某种程度上应该叫做“降维覆盖”。

我们在十几年前开始尝试，想形成以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中国话语的构建。应该说，在被西方话语体系覆盖的情况之下所进行的努力是十分艰苦的过程，但我们努力了。宏观上，我们研究团队出版了《八次危机》，讲中国1949到2009年所发生的宏观经济的波动周期，接着出版了《去依附》，专题介绍1949到1952年这三年时间的经济波动，这样实际上构成了对2009年之前

中国当代史上发生过的九次危机的解读；还出版了《全球化与国家竞争》，对具有代表性的新兴七国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中观层面上，我们研究团队出版了《解读苏南》《再读苏南》《解读珠三角》等，对不同地方的发展经验进行分析和解释。微观上，我们研究出版了《解读战旗》，从一个村庄奋斗的微观角度来解释中国发展经验。在农业领域，我们出版了《中国农业的生态化转型——社会化生态农业理论与实践》《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以全球气候、地理的历史演变为依据，对农业发展的演进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进而从国际比较的视野介绍了国内外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丰富经验。

扼要介绍这些出版物，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是想尝试着讲好中国故事，而且要认真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宏微观、多视角去解读。

时至今日，中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坚持了不同于西方制度的新型举国体制，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有效实行，解决了很多问题。无论是全球化的挑战，抑或是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新型举国体制都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符合中国的国情，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这项有效的经验，却引来西方国家坚持“反共”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近年来美国对华强硬政策从未停止，向中国发起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科学技术创新的动作，甚至还堂而皇之地认为中国的发展应归功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近年来，理论界很关注“三农”问题，但不少学者却继续把西方的理论逻辑套用在国情不同的本土问题上。西方学术界根据

“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的逻辑提出的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国内理论界得到普遍认可，除了外部资本利益集团急于下乡获利的背景之外，部分原因是其在理论逻辑上确实很完整。但把这种理论逻辑直接套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上，则显然缺乏经验依据。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在继承或采行西方制度之后，普遍受制于耕者无其田、城市贫民窟化和农产品全球分工体系，并由此造成经济波动、饥饿或社会动乱。

因此，我们亟须打破西方话语体系，形成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话语体系，避免被西方现代化模式牵着走。

发声，因为我们不能走向错误的道路。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当前，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有了很大的变化。第一个基本国情矛盾是“人地高度紧张”，其还没有根本扭转，所以才大量进口外国的能源、原材料、粮食、饲料等等；第二个基本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其却已经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从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到2017年确立乡村振兴战略，国家各部门已经向农村投资形成了几百万亿的设施性资产。因为，农民无力自主形成资本投资能力，农业无力完成资本积累，只好由政府投资来完成，这就已经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乡村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缓解了城乡二元对立结构。

但我们在原来二元结构体制下形成的制度、法律、政策乃至政策操作的部门都还没改。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比较倾向于把美国那套教科书理论体系搬过来，有人说美国农业农民如何好，规模大、产量高，其实概念错了，应该是说“美国农场主”

或“美国农业产业工人”如何。当时也有人主张把美国那一套农业现代化当做赶超目标，甚至到了30年后的今天，仍有学者提出要把美国规模化农业作为农业现代化目标。而现实中，因发展规模化农业失败跑路的投资者比比皆是。

我们非要邯郸学步吗？100年前的美国农业学者富兰克林·金博士到中国和日韩调研东亚小农村社制经济，不仅认识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形成的间作套种兼业化的有机农业，在切实而有效地养活了世界最大规模人口的同时也最好地维护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而且还对比了西方人（借助船坚炮利的殖民化粗暴占有原住民土地）形成的美国大农场才搞了100年就严重破坏了资源环境的教训。其实，若以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效率，中国仍然是土地产出率最高的国家。

党中央历来强调的规模化是以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为主体进行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从未肯定美国式大农场。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发展农业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有成功的吗？去实地调查一番就很清楚，一些走西方道路的南半球国家只不过沦为了给西方提供初始产品的附庸，深陷于“后殖民主义”单一经济不能自拔。

所以我们应遵循国情，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发展农业，要有历史耐心，不搞强迫集中，因地制宜探索不同农业区划的适度规模经营，既要因地制宜地搞好“大食物安全”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又得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他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讲话中特别指出，“世界上没有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诚然，这是我们此时发声的根本

原因。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由编纂者陈高威主动捉笔，大量收录了温铁军在各地的各类演讲，辅之以各乡建团队组织的调研报告、撰写的文章和未发文稿。也恰因来源多样而难免有文字较散、所设主题不易集中论述等内生性问题，遂有陈生八易其稿而我仍然不允付梓的2年延宕！最终，为了激励后进，也为了完善隐含在文字中的逻辑解释能力，虽入古稀之年仍不得不再体验了一回“半编辑半作者”的辛苦。

现在终于完稿了，需要真诚感谢团队成员董筱丹、邱建生、潘家恩、杨帅、黄志友、张俊娜、王茜、罗士轩、刘亚慧、马黎、王雅兰、周雅希等给予的支持与帮助。李晔老师为此书提出了宝贵意见，重庆出版社对此书的出版提供了大量支持，编辑徐飞对此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破局乡村振兴》写作组

陈高威起草于成都

温铁军修改定稿于北京

2022年12月25日

## 前言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新格局\*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摘自党的二十大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提出这“五个定位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需要摒弃过于激进的西方模式的城市化和金融

---

\* 部分内容发表于《重庆行政》2021年2期，略有改动。

化，要体现符合自己道路的现代化，其主要内涵是体现以广土巨族自治性的“14亿人口”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了发展路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我们对此的理解就是要以“三新（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其关键是要在空间生态资源再定价之中体现“空间正义”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打破造成严重生态和社会负外部性的发展旧格局，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同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党中央认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总体来看，“稳”是总基调。由于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作出了稳中求进的工作部署，中央“一号文件”呼应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稳中求进的会议精神。

想要求“稳”，必须按照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守好两个底线：一是必须保证粮食安全，二是防止出现规模性返贫；而坚守底线的根本在于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该怎么理解中央的乡村振兴战略调整？我们认为，应把三农工作放入我国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中来解构。“三新”这个词，可能大家很少深入去思考，我们简单回顾一下。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认为这是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

就“三农”工作来说，我们认为新发展阶段就是融入国内大循环，新发展理念就是“两山论”指导下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新发展格局就是城乡融合促进新型县域经济。

但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地方还是“三旧”：以全球化加工贸易型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为主是旧阶段，以资为本是旧理念，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的老方式发展是旧格局，以至于很多矛盾不能很好解决。

新发展理念和旧的理念有所不同，比如，现在我们面对的外部的不确定性，其实主要是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而全球化挑战最主要的矛盾就是全球过剩，全球过剩又主要是由近20年来西方主要国家增发大量货币，导致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这进一步演化为中国遭遇到“输入型通胀”，并导致资源环境被破坏和社会福利下降。中央在面对这些全球过剩的挑战时，开始做出战略性调整，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因此，贯彻落实好“三农”工作，就需要我们把握好“稳”的基本原则，守住守好两条底线的硬任务，坚持在“三新”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 一、贯彻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

在2000年以后全球气候变暖速度明显加快的挑战下，中国首先做出发展理念和战略的调整。2003年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明确不再以追求GDP为发展目标；2006年提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经济”目标；2007年进一步提出生态文明发展理念；2012年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也是在这个时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上正式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早在1988年习近平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时就已初步形成，后于2005年在浙江首次提出，并于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东北时增加了“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

山”的论述。在理论上，这意味着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下的新经济所内在的生产力要素得到了极大拓展，意味着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此外，党中央2005年确立新农村建设战略时就强调过“县域经济”，并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时再度强调了县乡村三级的规划整合，也就是新型县域生态经济，其主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把以往粗放数量型增长改为县域生态经济的质量效益型增长。在党的二十大上，中央一脉相承地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质上强调的就是生态文明战略。

新发展阶段有两个新经济类型作为国家战略调整的引领：一个是数字经济，一个是生态经济。通过这两个领域的新生产力要素的有机结合去改造旧产业，就会带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间与空间拓展；这与过去产业经济和金融经济两个阶段的经济领域有相当大的差别。

一百年来，中国追求的主要是产业资本扩张，理论上被叫作产业经济。21世纪前后，金融资本扩张逐渐成为主导力量，特别是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进入了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但是，这个阶段发生的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和2014年金砖国家需求下滑造成国内两次生产过剩，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一方面加入国际金融竞争客观上构成人民币与美元两大资本集团的对抗性冲突；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不能直接进行海外投资而只能滞留国内，遂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金融过剩和社会矛盾的加剧。

由此，中央不断做出调整：2012年确立生态文明战略转型、2014年认定“经济下行期”之后，2015年出台“工业供给侧改

革”，2017年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2019年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并且为防止金融异化而再三要求国内金融机构的投资不能脱实向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例如，国家农业银行必须坚守服务“三农”职责使命；再如，2020年要求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总之，中央要求金融业必须服务实体经济且以政治手段勒住金融资本异化实体的趋势，遏制国内金融部门走西方国家放任“野蛮生长”的虚拟化扩张的不归路。

与此同时，中央抓紧进行新经济转型，一方面是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数字经济，另外一方面则是正在开始形成的生态经济。如果数字经济和生态经济这两个转型能够成功结合起来，内涵式地服务于城乡融合，促进乡村振兴，帮助建构新型县域经济的新格局，中国就能够回避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产业资本异化社会到金融资本异化实体这样的一般演化规律所带来的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严重挑战。

##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新阶段需要构建新格局。乡村振兴是中国改变以往发展模式向新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为什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资本在制度上高度同构，对信息必须具有标准化、

可集成和大规模传输的要求不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的，产业资本对不同文化有强势摧毁的“普遍性”，所派生的文化教育模式也主要体现产业资本要求，是机械化复制的单一大规模量产“人力资源资本化”的产业方式。

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苏联式社会主义、东亚社会资本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强调大生产的“普适性”，其内涵仍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阶段派生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普世价值”被各种派别都当做“政治正确”的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普世价值”的最大的区别是把代表我们这种广土巨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做奋斗目标。据此，虽然中国产业资本总量和金融资本总量已经是世界第一，<sup>①</sup>但在发展方针上与西方有本质的不同。例如，我们在金融资本快速扩张的同时多次发文要求金融资本服务实体，严禁异化。又如，党中央提出的“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要求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直接结合，政府要服务于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生态经济，而不是单一的提高农业产出和产量。

因此，按照党的二十大精神，乡村振兴首先要摒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不能再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现代化要求制定中国农业现代化标准，而是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机制和制度特征形成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sup>①</sup> 参见《央行：中国金融业总资产达300万亿元银行业268万亿》，中国新闻网，2019年9月24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s/2019/09-24/8964011.shtml>。

###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县域经济、乡村振兴

理解新时代的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该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的新理念出发，因地制宜地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的价值化实现形式，将其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最终，是要通过货币化与差异化资本市场实现“生态资本深化”，创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新路径，这也是实现质量效益型的新经济的需要。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表示，我们这些年的投资已经形成了1300万亿元的设施性资产。<sup>①</sup>这个实体经济底盘足够大，但因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造成利益分割很多资产是沉淀的。

那么，县以下乡村大量沉淀资产如何被生态经济新的定价方式来激活，进而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振兴”？显然，这主要取决于如何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把现代资本市场的交易方式引入到农村资源性资产定价过程中来，结合中央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所实施的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来激活2005年以来国家大量投资在农村形成的沉淀资产。

新时代的生态化战略转型，主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基础。

<sup>①</sup> 宁吉喆在国新办2020年5月2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述：市场经济从会计学、统计学的角度是资产负债经济，企业都有资产负债表，国家也有资产负债表。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国家统计局编制了全国的资产负债表。最新的资产负债表表明，我国的总资产已经超过1300万亿元。这个资产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多年的投入、多年的发展形成的。